

上卷摇摇结构主义篇

摇摇结构主义不是一种新方法，而是被唤醒的杂乱无章的现代思想意识。

——米歇尔·福柯

鸣摇摇头

摇摇感谢所有慷慨应允并接受访谈的人们,这些访谈全都转引于此。为这段法国知识生活树碑立传,对于这一目标而言,他们的贡献是绝对必要的。每个接受访谈者的研究领域及联系方式,都可以在附录中找到。

摇摇他们是:马克·阿伯莱(配译粤粤粤)、阿尔弗雷德·阿德勒(粤粤粤粤粤)、米歇尔·阿列塔(配译粤粤粤)、让·阿卢什(分译粤粤粤)、皮埃尔·安萨尔(孕粤粤粤粤)、米歇尔·阿里韦(配译粤粤粤)、马克·奥热(配译粤粤粤)、西尔万·奥鲁(杂译粤粤粤)、科斯塔斯·阿克塞洛斯(运粤粤粤粤)、乔治·巴朗迪耶(配译粤粤粤)、艾蒂安·巴里巴尔(配译粤粤粤)、亨利·巴尔托利(匀译粤粤粤)、米歇尔·博德(配译粤粤粤)、达尼埃尔·贝克蒙(阅译粤粤粤)、让·原马里·伯努瓦(分译粤粤粤)、阿兰·布瓦西诺(粤译粤粤粤)、雷蒙·布当(配译粤粤粤)、雅克·布弗雷斯(分译粤粤粤)、克洛德·布雷蒙(悦译粤粤粤)、于贝尔·布罗希耶(匀译粤粤粤)、路易·原上·卡尔韦(运粤粤粤粤)、让·原克洛德·舍瓦利耶(分译粤粤粤)、让·克拉夫勒尔(分译粤粤粤)、克洛德·孔泰(悦译粤粤粤)、让·原克洛德·科凯(分译粤粤粤)、玛丽亚·达拉齐(配译粤粤粤)、让·原图桑·德桑蒂(分译粤粤粤)、菲利普·德科拉(孕译粤粤粤)、樊尚·德孔布(灾译粤粤粤)、让·原马里·多梅纳克(分译粤粤粤)、若埃尔·多尔(分译粤粤粤)、达尼埃尔·多里(阅译粤粤粤)、罗歇·原波尔·德鲁瓦(配译粤粤粤)、让·迪布瓦(分译粤粤粤)、乔治·迪比(配译粤粤粤)、奥斯瓦尔德·迪克鲁(韵译粤粤粤)、克洛德·迪梅齐(悦译粤粤粤)、让·迪维尼奥(分译粤粤粤)、罗歇·埃斯塔布莱(配译粤粤粤)、弗朗索瓦·埃瓦尔德(云译粤粤粤)、阿莱特·法尔热(粤译粤粤粤)、让·原支

埃尔·费伊(分译)阿蒙·菲勒、皮埃尔·富热罗拉(分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弗朗索瓦丝·加代(云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马塞尔·戈谢(配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热拉尔·热奈特(配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让·原克里斯托夫·戈达尔(分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莫里斯·戈德利耶(配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吉勒·加斯东·原格朗热(配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弗拉迪米尔·格拉诺夫(幸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安德烈·格林(粤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阿尔吉达斯·朱利安·格雷马斯(粤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马克·吉尔劳姆(配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克洛德·阿热日(悦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菲利普·阿蒙(分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安德烈·原乔治·奥德里古(粤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路易·艾(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保罗·亨利(分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弗朗索瓦丝·埃尔蒂热·原奥热(云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雅克·瓦罗(分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米歇尔·伊扎尔(配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让·原吕克·雅马尔(分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让·雅曼(分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朱丽娅·科里斯蒂娃(分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贝尔纳·拉克斯(月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热罗姆·拉勒芒(分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让·拉普朗什(分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弗朗辛·勒布雷(云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塞尔日·勒克莱尔(分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多米尼克·勒古(阅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亨利·勒菲弗尔(云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皮埃尔·勒让德尔(分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热妮·勒穆瓦纳(配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克洛德·列维·原斯特劳斯(悦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雅克·莱维(分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阿兰·利皮耶茨(粤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勒内·卢罗(配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皮埃尔·马舍雷(分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勒内·马若尔(配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塞尔日·马丁(分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安德烈·马蒂内(粤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克洛德·梅拉苏(悦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夏尔·梅尔曼(悦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热拉尔·芒代尔(配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亨利·密特朗(云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朱昂·原大卫·纳西奥(分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安德烈·尼古拉(粤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皮埃尔·诺拉(分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克洛迪娜·诺尔芒(悦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贝特朗·奥格尔维(月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米丝尔·佩罗(配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马塞兰·普利耐(配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让·普永(分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若埃勒·普鲁斯特(分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雅克·朗西埃(分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阿兰·勒诺(粤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奥利维耶·勒沃·达隆内(韵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伊丽莎白·鲁迪奈斯科(分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尼古拉·吕威(粤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穆斯塔法·萨福安(配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乔治·原埃利亚·萨尔法蒂(分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贝尔纳·西谢尔(月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丹·斯佩尔伯(阅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约瑟夫·森普夫(分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伊曼纽尔·泰雷(分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茨维坦·托多罗夫(分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、阿兰·图雷纳(粤译)埃云·埃云·埃云

裁理恩翰、保罗·瓦拉迪耶(孕志育育恩翰)、让·原皮埃尔·韦尔南(孕志育育恩翰)、
 潮腹火巢裁械、马克·韦尔内(孕志育育恩翰)、塞尔日·维德曼(孕志育育恩翰)、
 皂裁)、皮埃尔·维拉尔(孕志育育恩翰)、弗朗索瓦·瓦尔(云裁械音辛裁)、玛
 丽娜·亚热罗(孕志育育恩翰)。

摇摇还有一些人虽然取得了联系,却没有达到访谈的目的。他们是迪迪埃·
 安齐厄(阅裁械音辛裁)、阿兰·巴迪乌(粤裁械音辛裁)、克里斯蒂安·博
 德洛(悦裁械音辛裁)、让·博德里亚(孕志育育恩翰)、皮埃尔·布尔
 迪厄(孕志育育恩翰)、乔治·康吉扬(孕志育育恩翰)、科尔内留斯·
 卡斯托里亚迪(悦裁械音辛裁)、埃莱娜·西库(匀裁械音辛裁)、塞尔
 日·科特(孕志育育恩翰)、安托万·居里奥利(粤裁械音辛裁)、吉勒·德勒兹
 (孕志育育恩翰)、雅克·德里达(孕志育育恩翰)、路易·迪蒙(孕志育育恩翰)、
 皂裁械、朱利安·弗洛恩德(孕志育育恩翰)、吕斯·伊里加雷(孕志育育恩翰)、
 庸)、弗朗西斯·雅克(云裁械音辛裁)、克里斯蒂安·让贝尔(悦裁械音辛裁)、
 皂裁械、卡特琳·凯尔布拉·原雷西奥尼(悦裁械音辛裁)、维克多·
 卡拉迪(孕志育育恩翰)、塞尔日·原克里斯托夫·科尔姆(孕志育育恩翰)、
 庸)、克洛德·勒福尔(悦裁械音辛裁)、菲利普·勒热纳(孕志育育恩翰)、
 庸)、埃马纽埃尔·勒维纳(孕志育育恩翰)、让·原弗朗索瓦·利奥
 塔尔(孕志育育恩翰)、热拉尔·米勒(孕志育育恩翰)、雅克·原阿兰·
 米勒(孕志育育恩翰)、让·原克洛德·米尔纳(孕志育育恩翰)、埃
 德加·莫兰(孕志育育恩翰)、泰蕾兹·帕里佐(孕志育育恩翰)、让·原克洛德·
 帕斯龙(孕志育育恩翰)、让·原贝特朗·蓬塔利(孕志育育恩翰)、
 庸)、保罗·利科尔(孕志育育恩翰)、雅克利娜·罗米伊(孕志育育恩翰)、
 庸)、弗朗索瓦·鲁斯唐(云裁械音辛裁)、米歇尔·塞尔(孕志育育恩翰)、
 庸)、路易·原樊尚·托马(孕志育育恩翰)。

摇摇我还要感谢下列人士,他们的艰巨使命就是阅读本书初稿。他们的批
 评和建议使得我做起这项工作来,不再感到力不从心。他们是达尼埃尔·
 贝克蒙(阅裁械音辛裁)和特吕蒂·贝克蒙(裁械音辛裁)、阿兰·
 布瓦西诺(粤裁械音辛裁)、勒内·热利(孕志育育恩翰)、弗朗索瓦·热兹
 (云裁械音辛裁)、蒂埃里·帕科(裁械音辛裁)。

摇摇下列人士为我提供了有关这个时期的诸多书籍,我在此深表谢意。他
 们是:门槛出版社(孕志育育恩翰)的莫妮克·吕兰(孕志育育恩翰)、加利
 玛出版社(孕志育育恩翰)的皮埃尔·诺拉(孕志育育恩翰)、德库韦尔出版
 社(孕志育育恩翰)的克里斯蒂娜·席尔瓦(悦裁械音辛裁)。

序摇摇言

摇摇在法国知识生活史上,结构主义在五六十年的功成名就,是史无前例的。结构主义赢得了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如此广泛的支持,以至于在我们所谓的结构主义鼎盛时期,任何微不足道的抵抗和异议都会胎死腹中。如果领悟了当时的语境,那么我们会更好地理解,何以如此众多的知识分子陶醉于完全相同的纲要之中。

摇摇结构主义之所以能显赫一时,原因有二。第一,结构主义承诺提供严密、精确的方法,并希望在寻求科学性(泽霖燥译)的征程中迈出决定性的一步。但是更为重要的是,第二,它是思想史上的一个特殊时刻,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批判意识发展的关键性时刻。结构主义的纲要引起了特别广泛的狂热者的关注,包括国家足球队教练。在 1960 年代,这位教练宣称,为了取得更好的战绩,他对足球队进行了“结构主义”改组。

摇摇因此,结构主义范式的大获全胜,是特定历史语境下最早的产物之一,是 19 世纪末以来,特别是 1950 年以来,西方一步步地走向列维·斯特劳斯所谓的时间冷藏器(泽霖燥译)的日积月累的结果。但同时它还是社会科学显著成长的产物,它与老态龙钟的索尔邦迎头相撞,而索尔邦当时是学术正当性的持有者,也是人文学科的施予者。结构主义纲要真正的无意识策略,就是搬开大权在握的学院主义。它要达到双重目的:既要大胆竞争,又要反对主流文化。在学术的范围内,结构主义确立的范式成功地净化了被禁知识(泽霖燥译)的基础,这些知识早就被抛之野外,处于正规机构(泽霖燥译)的边缘地带了。

摇摇结构主义是对西方历史上一个特定时刻的抗争与回应。在一定程度上,它表达了自我仇恨,表达了对传统西方文化的拒绝,表达了在寻求新模型(泽霖燥译)的过程中对现代主义的渴求。古代的价值观念不再

有口皆碑。与此同时,结构主义展示了极强的感受力,它对在西方文化中遭受压抑之物心有灵犀。因此,这一时期的两门主导性科学(人类学和精神分析),都赋予无意识以特权,这绝非偶然。无意识处在显在意义(意识)之下,因为在西方长期遭受压抑而无人能够接近。

摇摇结构主义也处于这样一个时代:语言学成了科学的领头羊,它带领社会科学一步一步地迈向科学的至境。在这方面,结构主义成了一面大旗,“今派”(新派)扛着它与“古派”(传统派)一决雌雄。作为20世纪后半叶社会思想的觉醒,对于许多具有政治义务感的知识分子而言,结构主义还成了用来完成非意识形态化(非意识形态化)使命的工具。这是一个以觉醒为标志的特定的政治时刻,也是一个特定的知识配置,它需要一场革命才能成功地完成一项改革。只有具备了这一切,才能使结构主义成为整整一代人的聚集地。这一代人发现了隐藏在结构网格(结构网格)下面的世界。

摇摇面对存在主义造成的混乱局面,结构主义努力寻求解决方案,这导致了结构本体化的倾向。在科学的名义下,结构成了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另一个选择对象。在这个时期,结构主义可谓野心勃勃,知识的分界线被不断重新划定,图表的疆界也一再得以扩展。许多人都踏着最新的道路蜂拥而行,而这些最新道路是由处于鼎盛期的社会科学开辟出来的。

摇摇不过,突然间乾坤逆转。20世纪60年代初,悲剧降临到结构主义头上。在同样的猝然打击下,这一国际史诗中的多数法国主人公,纷纷离开了生命的舞台,仿佛这些终结人文学科的理论家们在辉煌的死亡中,不谋而合地放弃了自己的生命。

摇摇1963年5月11日,尼科斯·普兰查斯从自家的窗子跳下,结束了自己的一生。那时,他刚刚为自己背叛皮埃尔·戈尔德曼的行为做完辩护。他的自杀,是对纯然



罗兰·巴特

假想出来的犯罪行为的肉体惩罚。

摇摇在与雅克·贝尔克、弗朗索瓦·密特朗(当时的社会党主席)共进午餐之后,罗兰·巴特在赶往学校的路上,被一家干洗店的卡车撞倒了。巴特只是受了点轻微的脑颅外伤。但是,据去萨彼里埃医院⁽¹⁵⁾探望过他的目击者称,巴特破罐子破摔,最终在 1980 年 1 月 10 日呜呼哀哉了。

摇摇在 1980 年 1 月 10 日的夜间,路易·阿尔都塞掐死了忠贞的妻子埃莱娜·阿尔都塞。法庭判决,这位最严格的理性主义的杰出代表人物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,并被安置在圣安娜医院(圣安娜精神病院)就医,这多亏了他以前的哲学老师让·居东的援手。圣安娜医院是一所精神病院,此前一直被视为巴黎市区的私人诊所。

摇摇 1980 年 1 月 10 日,雅克·拉康这位能言善辩之人,这位现代伟大的萨满教巫师死了,死前患有失语症。

摇摇刚刚过去几年,死神的黑旋风又掠走了米歇尔·福柯的性命。在声望如日中天之时,在完全沉浸到性史的著述中时,福柯受到 20 世纪新瘟疫(艾滋病)的打击。他死于 1984 年 6 月 25 日。

摇摇如此众多的前赴后继的戏剧性死亡,强化了这样的印象:一个时代终结了。有人甚至从理论上概括这些悲剧性事件,认为这些悲剧性事件表明,一种共同思维方式已经陷入绝境,一般把这种共同思维方式称为结构主义。如此说来,沉思默想与现实世界的断裂,导致了自我毁灭。与 20 年代的间接赞美相比,把沉思默想与现实世界并置一处,显得更加虚假不实。在 20 年代,结构主义誉满天下,与其一道,“四个火枪手”也头顶鲜花。那时他们是五人:米歇尔·福柯、路易·阿尔都塞、罗兰·巴特、雅克·拉康,还有他



“四个火枪手”(福柯、拉康、列维·原斯特劳斯和巴特)

则》(《~~德名词语典~~》)一书中确立的。在 1910~1919 年期间,结构派生了结构主义,安德烈·拉朗德在《辞海》(《~~大辞海~~》)中还称之为新词。对于心理学家来说,结构主义是在 20 世纪初应运而生的,它是专门用来反抗功能心理学的^①。但是就其现代意义而言,就其应用于全部人文科学的规模而言,此一实践的真正起源得益于语言学领域的发展。索绪尔在其《普通语言学教程》(《~~现代语言学~~》)中,只有三次用到“结构”一词。后来,布拉格小组(特鲁别茨科伊和雅各布森)概括了“结构”与“结构主义”的用法。丹麦语言学家叶姆斯列夫声称,可以把“结构主义”一词当成一个基本范式来用,而他的所作所为进一步明确了这个倾向。1923 年,他找到了一卷《语言学学报》(《~~语言学~~》),其首篇论文就以“结构语言学”为题。从这一角度看,此一术语在所有社会科学领域都带来了真正的革命,并成为 20 世纪的核心。各门社会科学都相继承认,它们受到了科学的洗礼。

摇摇这究竟是惊人的奇迹,还是空中的楼阁?毕竟,科学史不过是科学理论的墓地史而已。这当然不是说,被甩在身后的每一个阶段都已成为一堆废物,而是说,任何纲要都已经失去其能产性(《~~索绪尔~~》),并经历方法论的更新。不过,和结构主义一道,变革也冒了一定的风险,即跌入以前的方法竭力避开的陷阱。在认清其局限性之前,有必要首先阐明结构主义的丰富性和能产性。这正是我们所要承担的风险之所在。尽管结构主义有时也钻死胡同,但它还是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认识人类社会的方式,以至于如果不考虑结构主义的革命,我们甚至都不会思考问题了。

摇摇结构主义的到来也是我们知识史的一环,它开辟了社会科学研究异常繁荣的时代。重建其历史无疑是棘手的,因为“结构主义”疆界的轮廓含混不清。为了理解这个时期的大致情形,我们必须重建其方法,重塑其人物。与此同时,在不采取化约主义立场的同时,寻找某些具有凝聚力的核心。因为超越了名目繁多的对象和学科,这些核心也揭示了纲领的母体。要划分不同的层面,要辨析众多的结构主义,虽然它们均以“结构主义”一词为根基。我们可以澄清基本的知识争端,这些争端既是理论性的也是学科性的;我们可以追寻每个轨迹带来的财富,这是难以在群体历史中一言以蔽之的。虽然它揭示了某些意外而重要的相遇的偶然性,但这部历史著作还是要努力融合不同的对象,带来诸多解释性因子,而丝毫不将其化约为任何单一的因果性。

摇摇社会科学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使用结构主义。各种借来的观念、类比、转

喻在相互作用,而我们有义务一一将其澄清。此外,遵循着罗兰·巴特对未来的研究结构主义的历史学家的忠告,我们将提出一个分类,该分类与学科的划分并不完全一致。科学结构主义(摇摇摇摇)特别明显地展示在列维·斯特劳斯、格雷马斯和雅克·拉康那里,同时它还涉及人类学、符号学和精神分析。与寻求天然法则相关的,是更加伸屈自如、起伏不定、熠熠生辉的结构主义,这可以在热拉尔·热奈特、茨维坦·托多罗夫、米歇尔·塞尔的著作中找到,我们可以称之为记号学结构主义(摇摇摇摇)。最后,还有历史化的或认知性的结构主义(摇摇摇摇)。路易·阿尔都塞、皮埃尔·布尔迪厄、米歇尔·福柯、雅克·德里达、让·皮埃尔·韦尔南,或者广而言之,《年鉴》(摇摇)的整个第三代,都可以划入此列。不过,在超越了这些分类之后,我们可以确立他(它)们在语言上和目标上所具有的共同性,它予人以这样的印象,我们正在阅读同一部书,尽管它们的风格五光十色,它们的学科五花八门。正是因为风格和学科上存在差异,我们才能把巴特与福柯、德里达、拉康区分开来。结构主义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语(摇摇),尽管并不存在学说上的千篇一律,甚至不存在一个学派,在形形色色的代表之间也没有发生什么大的争执。

摇摇与对结构主义进行分期相比,重建这一时期的历史,也容易不到哪里。在摇摇年代,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结构现象无可抗拒的增长。到了摇摇年代,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采用了货真价实的结构主义模式。摇摇年以前,结构主义一直处于上升期,其上升的势头似乎是难以遏止的。摇摇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。这一年,结构主义活动在知识界强劲有力地声名远播起来,记号世界的融合也开始大放异彩,并超出了既定的学科界限。不过,到了摇摇年,结构主义开始衰微,批评之声不绝于耳,疏远结构主义方法的做法悄然流行。伴随着新闻界的一片赞美声,这一势头从各个方面显示出来。如果说结构主义的退潮在摇摇年只是隐约可见的话,那么到了摇摇年,一切都昭然若揭了。这一年,“四个火枪手”不约而同地与结构主义现象分道扬镳了。

摇摇不过,还有另外一种时间性(摇摇),它没有受到知识时尚变迁的侵袭。大学研究一如既往地繁荣着,尽管黄土已经埋到了脖子上。大学研究仿佛一个纲要的众多源泉,在媒体的迷惑之下,它已经丧失了它在教学有效性中积累起来的一切。这倒不是说存在着单一的学术时间性,因为在人文学科中,总是存在着或长或短的延迟时间。比如,对于语言学、社会学、人

类学或精神分析来说,结构主义提供了一个拿手的科学模型。而另外一些学科,比如历史,因为长期根植于大学,没有受到认识论骚乱(认识论上的解构)的干扰,所以总是在稍迟一些的时候脱胎换骨,采纳结构主义的纲要。可是到了这时,结构主义的衰退已经势不可挡了。尽管在这场知识交流的游戏存在着暂时的延迟,结构主义还是使许多对话成为可能,使富有成效的座谈会的数目成倍地增加,派生出更多的研究,激发起人们对相关学科的著作及进展情况的兴趣。这是一个激情澎湃的时代,激情是由这样的思想家们激发起来的,他们一直试图协调研究与生活之间的矛盾,使其和谐相处。这场货真价实的革命依然影响着我们的世界观。

摇摇我们这个时代,有人称之为空虚年代(20世纪60年代),有人称之为后现代(20世纪70年代)。无论称之为什么,它总是需要一种审视人的方法。依据这种方法,两极对立(每一极都是幻想出来的)被终结了。一极是人的瓦解,一极是人的圣化,前者为结构主义所独钟,后者则是对前者的回应。一旦超越了时代的限制,人这个创造者就会成为人之死亡的镜像。为结构方法的范式而迷失的人性,再次显现在有关前社会科学时代的自恋意象中。巨大的结构浪潮把社会科学冲向岸边,在那里,历史性(历史性的回归)是一个陌生的怪物。但是我们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,这表现在对古代书写形式的回归。回归是在下列名义下完成的:思想的退潮,价值的迷失,对传统的依赖。识途的老马归来了,维达尔式(20世纪60年代)的风景诱人的魅力,拉维斯式(20世纪70年代)的历史英雄的业绩,拉加德与米沙尔(20世纪80年代)的国家文学宝库中的杰作。这是对 19 世纪的回归,诱使人们超越这一回归的是 19 世纪对人的看法。在那时,人被设想为某种抽象,他摆脱了时间的制约,精通合法的政治制度,而这样的政治制度是人类理性主义的象征。

摇摇不过,如果没有哥白尼原伽利略革命,如果没有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决裂,如果没有社会科学的进步,我们会如此这般对人进行反思吗?挑明结构主义的短处,并不意味着要回到启蒙运动的黄金时代。恰恰相反,这样做,为的是走向未来,确立历史人文主义。指出虚假的信仰和真实的教条,揭示化约主义的机械的程序,质疑社会科学跨学科使用的横向概念的有效性,这些都是十分必要的。这样做,不是为了确立一个包罗万象的程序或无形流程,而是要从布朗式的运动(布朗运动)中,夺回人文科学的绪论,它是由某些概念和可操作的结构层面组成的。

摇摇我们要考察社会科学所取得的进步,以此回应人文主义的诞生。人文

主义的诞生是可能的,或许还是围绕着对话人的过渡形象形成的。超越结构主义,需要回到人文主义那里,因为只有这样,才能考察为一切社会科学所广泛采用的结构方法,叙述其横扫天下的各个阶段,评价使某个方法为所有的社会科学所采纳的过程,理解其局限和绝境(在这里,脱胎换骨的努力全都以失败告终)。

摇摇为了说明发生在五六十年代的法国知识篇章,我们请众多的创始者及其门徒评论这个时期的主要著作,也请其他流派的参与者和潮流的支持者,对这些著作投去批判的一瞥。对哲学家、语言学家、社会学家、历史学家、人类学家、精神分析学家以及经济学家所做的大量访谈,已经融入这些文字。而且他们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:结构主义对于他们的著作和研究的重要性,以及超越结构主义的各种可能的途径。这个两卷本的调查揭示出,尽管众说纷纭、莫衷一是,结构主义现象的核心性使得对结构主义进行分期成为可能。^{〔源〕}

摇摇试图进一步分解西方形而上学,在记号学的基础上洞悉其裂隙,腾空每一个所指和全部意义以使纯粹的能指更加有效地自由流通,这样的批评形式属于西方历史上的自恨时期。我们已经被这一时期远远地甩在身后,这多亏了知识界与自由价值逐渐达成的妥协。要走出这个被批评范式命名的时期,盲目地回到老路上是行不通的。尽管如此,回归还是必要的,因为只有这样,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一时期。这个时期的贡献在于,它已经无可逆转地改变了我们对人类的理解。

注摇摇

〔员〕萨彼里埃(圣路易医院)医院创办于 1545 年,是巴黎第六大学的附属医院,位于巴黎第十三区,据说是欧洲最大的医院之一。——译者注

〔圆〕在我国的心理学科中,“结构主义”一般译为“构造主义”。——译者注

〔猿〕共同语(普通话)是一种折中语言,通常由一种语言的几个方言构成,但多以一种主要方言为基础。共同语一名来源于希腊“共同”一词,作为专有名词开始是指雅典希腊语。——译者注

〔源〕这项调查由两卷组成,分别对应结构主义发展的两个主要阶段:上升期(上卷《结构主义篇 1953-1957》)、衰败期(下卷《解构主义篇 1957 年至今》)。

第一部 摇篮年代：史诗时期

一摇巨星陨落 :让 原保罗·萨特

摇摇按照规则 ,在新英雄出场之前 ,总是要有人牺牲。因此 ,结构主义的粉墨登场需要有人献身 ,而不归之人则是战后知识分子的守护神让 原保罗·萨特。自从解放以来 ,萨特就拥有众多的追随者 ,因为他把哲学带到了大街上。但大街上慢慢开始传播一个挥之不去的传闻 ,正在崛起的一代将缓慢而坚实地把萨特挤向舞台的边缘。

摇摇在后来被称为“结构主义十年”的重要时期 ,萨特经历了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破裂。对于他来说 ,这样的遭遇既痛苦 ,又充满了戏剧性。那时候 ,萨特日甚一日地与世隔绝起来 ,尽管他在公众中的声望丝毫都没有衰减。在某种程度上 ,他要为自己痛苦的衰败承担责



萨特

任,因为他一直想抹去他对政治漠不关心,对社会麻木不仁的岁月。在 1940 年代,尽管纳粹主义的恐怖已经弥漫开来,萨特依然忠于长期以来追求的文科预备班^[1]传统,依然对窗外之事充耳不闻,依然保持聋哑状态,依然对他周围的社会斗争熟视无睹。战后,这段历史开始回过头来毒害他,因为他想有所补偿。1946 年,正值冷战的高峰时期,他与法共(共产党)结成了紧密同盟。而那时,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开始退党,因为斯大林主义在苏联的肆虐被披露了出来。民主革命联盟(革命民主主义联盟)在 1947 年 1 月 20 日(即 1947 年 1 月 20 日)时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大联合终于土崩瓦解了。而在 1955 年 5 月 1 日,它亲眼目睹了安德烈·布雷东、阿尔贝·加缪、大卫·鲁塞、萨特等许多知识分子^[2],一起步入了同一个音乐大厅[普莱耶大厅(普莱耶大厅)],围绕着“心智的国际性”(国际性)问题展开论争。

摇摇对于萨特来说,由此开始了一系列的绝交。冷战感染了《现代》(《现代》)编辑小组,而为了“不让比兰科^[3]失望!”(不让比兰科失望!),萨特付出了高昂的代价。1956 年,在经历了一场苦涩的争论后,他



莫里斯·梅洛 原庞蒂

让克洛德·勒福尔离开了杂志,而克洛德·勒福尔一直是编辑小组中的中坚人物。^[4]又有两次绝交事件随之而来。第一次是与加缪和埃蒂安布勒,第二次是与莫里斯·梅洛原庞蒂。埃蒂安布勒是萨特的挚友,也是《现代》杂志编委会的创始人。在此之前,萨特与梅洛原庞蒂的关系十分融洽,两个人好得“穿一条裤子”^[5]。但在 1956 年的夏天,梅洛原庞蒂离开了《现代》杂志。稍后不久,1957 年,他出版了《辩证法历险记》(《辩证法历险记》)。在该书中,他公开谴责萨特极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倾向。其他的冒险经历,即使没有萨

特也会照来不误的，但是年轻一代依然迷恋于他。雷吉斯·德布雷说过：“对于我们这些 缘年代的高中生来说，《存在与虚无》令人心跳加速。”^{〔10〕} 不过，存在主义开始遭受攻击。依德布雷之见，在 员年，在位于乌尔姆大街（则）上的高等师范学校^{〔11〕}，一场口水战使萨特与阿尔都塞剑拔弩张。让·伊波利特、乔治·康吉扬和梅洛原庞蒂都学于斯，教于斯，终于斯。德布雷当时正在准备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（葬），显然他站在阿尔都塞一边。尽管声望不减当年，但萨特开始代表过时的价值观念，开始体现解放以来令人失望的希望。这一形象牢牢地粘在了他的身上，他将成爲第一个牺牲品。

摇摇因为政治争端的缘故，萨特这颗明星陨落了。尽管如此，萨特的陨落还受到了外在形势的干预，某些外在因素开始改变知识界的现状。社会科学的崛起强化了制度性存在方面的对峙，所以，在传统的人文学科（主要是文学）和硬科学之间，需要一块中间地带。结果，提出的问题有云泥之别。而



员年。后排左一为拉康，左五为毕加索，右二为波伏瓦。前排左一为萨特，左二为加缪。

萨特,因为忠于自己作为哲学家的立场,因为忙于修补自己的政治经历,终于落伍了。虽然他的哲学家身份保证了社会对他的感谢和认可,但他依然对正在发生的变化一无所知。如果说,在 1955 年,萨特回答了《何谓文学》的问题,那他也是为了详细阐明作者(写作的动机)与公众之间的关系。文学及其单一性的存在,是不言自明的。但是到了 1960 年代末,这一假定开始受到质疑和攻击。

摇摇萨特所体现的守护神崩溃了,由此造成了不确定性和怀疑时代的到来:面对逐渐上升的社会科学,哲学家应当如何使自己的批判性质疑变得更加锋芒毕露?萨特式的人物之所以能够存在,只是凭借了自己意识的意向性(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摇)而已。人们谴责他追求自由,因为他说过“存在先于本质”,他认为只有异化和恶劣信仰,才阻挡了追求自由的征程。例如,罗兰·巴特二战一结束,就把自己界定为萨特式的人物,后来渐渐放弃了自己的哲学,为的是着手结构主义的探险。作为一种有关主体性和主体的哲学,存在主义开始受到攻击,而主体与良知也让位于规则、语码和结构了。

让·普永 站在中间地带上的人

摇摇有一个人物,他既是这一革命的象征,又竭力调和表面上的矛盾,他就是让·普永。他是萨特的密友,又是《现代》杂志与《人文》杂志(摇摇摇摇)之间的唯一桥梁。这就是说,他是萨特与克洛德·列维·斯特劳斯的唯一桥梁。让·普永很早以前(1952 年)就认识萨特,这两个人自始至终都保持着风平浪静的友情,尽管他们走的知识之路并不相同。退一步说,普永的一生是不寻常的一生。

二战期间我一直当我的哲学教授,不过到了 1952 年,萨特问我愿不愿意搞哲学?我回答说,我倒是挺乐意在一班学生面前扮演小丑,但问题是要批改家庭作业,而且薪水很低。于是他要我离开那里,去拜访他高等师范学校的一个朋友。他那位朋友发现了一样东西,即国民议会(摇摇摇摇摇摇摇摇)的分析报告。考虑权限分离的问题,立法机构特别慷慨地批准了它自己的行政部门的预算,因此行政部门的工资远远高于教师,并且通常一年有六个月的假期。我参加了考试,同时我也正在做我想做的东西,为《现代》杂志撰稿。1954 年,克洛德·列维·斯特劳斯邀请我加入《人文》小组,这也是确凿无疑的。我没有走上职